

“全面三孩”政策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意愿：生命史策略的中介作用

郭明琴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系，广西 桂林

收稿日期：2022年1月18日；录用日期：2022年2月18日；发布日期：2022年2月25日

摘要

生育赤字、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21世纪全世界面临的难题，如何提高国民生育意愿，缓解潜在的人口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已成当务之急。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生命史策略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意愿的中介作用进行考察。结果显示：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2) 生命史策略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的间接效应显著。

关键词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生育意愿，生命史策略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 under the “Universal Three-Child” Policy: The Mediating Role of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Mingqin Guo

Faculty of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Received: Jan. 18th, 2022; accepted: Feb. 18th, 2022; published: Feb. 25th, 2022

Abstract

Birth deficit and population aging have become problems faced by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How to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of citizens to have children, alleviate potential population prob-

lems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has become a top priority. This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fertility willingness. 2) The indirect effect of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 was significant.

Keywords

Socioeconomic Status, Fertility Willingness,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从国家统计局二十年来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不仅步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邢采,孟彧琦,林青青,秦子玉,2019),而且生育率持续下滑,成为世界人口大国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刘金菊,陈卫,2019)。“七普”数据的公布使得我国再次掀起一股讨论热潮,生育率又一次成为国民关注热点(人民网,2021)。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央政治局,2021-5-31)。生育率作为一个平衡社会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重要的因素,长期低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吴帆,2019),与此同时,我国已步入“低生育陷阱”的高度风险期(吴帆,2016),提高我国生育率已成当务之急。

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高生育率,如2013年12月、2016年1月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全面实行“二孩政策”,可生育率不增反降,2017年我国出生率同比2016年下降0.52%(陈卫,2019)。该现象说明,即使解除生育数量限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2021年2月1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民众生育意愿受经济社会因素影响明显。据全国妇联2016年调查显示,53.3%的受访家庭表示不想生育二孩,其中城市家庭占据比例超过60%,在发达省份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生育二孩的意愿相对较低。

以上的数据表示,社会经济结构会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但以往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多为人口学研究(方长春,陈友华,2016;汤兆云,郭真真,2012)。相比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更可能发生变动,因而更可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王记文,2018)。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探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2.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意愿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al-economic Status, SSS)指个体与周围他人比较后产生的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的看法(Singh-Manoux et al., 2003)。所谓“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SSS在对个体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产生重要影响(洪岩璧,华杰,2020)。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Flanders et al., 1975)认为,个体的主观规范(感受到的社

会压力)和知觉行为控制(对自身能力、资源和机会的感知和评估)会直接影响行为模式(生育意愿) (茅倬彦, 罗昊, 2013)。另外, Gary S. Becker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预测, 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生育意愿较低(Becker, 1960)。以往研究表明, SSS 和生育意愿多为负相关关系。实证研究提供支持, 如茅倬彦通过跟踪调查 18638 名被试发现, 关注生活质量的个体更容易生育意愿更低(茅倬彦, 罗昊, 2013); 同时 Whelpton 在研究中发现, SSS 越高, 实行避孕的夫妇比例越高, 生育意愿越低(Whelpton, 1949)。此外, 跨文化发现一致结果: 如 Baizan 对英国、奥地利、法国、挪威的研究发现, 高 SSS 的个体更重视自身发展, 子女数量更少(Baizan, 2021)。基于大数据分析也得到类似结论: 如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中, SSS 与生育意愿存在负相关(陈建新, 王莉君, 2021); 学者 Torres (2020)对 6 个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和巴拉圭)人口普查样本进行分析, 发现高 SSS 相比低 SSS 的个体生育意愿水平更低。

以往研究均揭示了 SSS 对生育意愿的直接影响, 但是这种联系的内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不清晰。因此本研究试图探究 SSS “经由何种因素”(中介变量)影响个体生育意愿。

2.2. 生命史策略的中介作用

我们试图探索 SSS 影响生命史策略的心理机制, 提出假设生命史策略可能会在 SSS 和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首先, SSS 可能影响生命史策略。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Strategy)是个体对有限资源进行权衡分配的重要结构, 包括个体在躯体努力(somatic effort)和繁衍努力(reproductive effort)之间的资源分配权衡(Figuero et al., 2014; 林镇超, 王燕, 2015)。

尽管已有研究对 SSS 影响生育意愿的可能原因做出解释, 例如, 认知行为方面, 家庭规模偏好在 SSS 和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Zhang, 2004); 在社会环境方面, 收入和教育水平更高可能会对其生育意愿产生影响(Berent, 1952; Boberg-Fazlic, Sharp, & Weisdorf, 2011), 但较少研究者从生命史策略这一视角去探讨 SSS 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王燕等人(2017)研究认为, 高 SSS 与延迟满足相关, 而延迟满足被反复证实是生命史策略的重要心理指标(Griskevicius, Tybur, Delton, & Robertson, 2011b)。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可以解释个体生活经历与其行为模式的关系, 个体特有的生活经历(如成长的环境)会影响个体的行为模式, 从而形成不同的生命史策略。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该理论, 一项来自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高 SSS 与“慢策略”存在显著正相关(Griskevicius, Delton, Robertson, & Tybur, 2011a)。实验室研究同样发现相似结果, 在启动被试高 SSS 的时候, 个体更倾向于做出保守行为持“慢生命史策略”(Griskevicius et al., 2013)。

Griskevicius 等人(2013)提出的敏感化模型(Sensitization Model)指出, 个体通过对外界环境(如 SSS)的经验感知会塑造个体的生命史策略, 从而对个体的行为方式(如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根据进化学理论的观点, 个体都有延续自身基因的本能倾向(王煜, 李梦菊, 2020), 个体持“快生命史策略”会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繁衍后代(Griskevicius, Delton et al., 2011a)。Ellis 等人(2009)的实证研究认为, 持“快策略”更倾向于做出着眼于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的行(Ellis, Figueredo, Brumbach, & Schlomer, 2009)。实验室研究同样发现相似结果, 在启动低 SSS 并处在不可预测环境后, “快策略”个体相比“慢策略”个体更愿意保护和传承基因 (Griskevicius et al., 2013), 生育意愿更强。

总体来说, SSS 一方面会影响个体的自我发展和资源分配, 引发个体朝着不同的生命史策略方向发展(Griskevicius et al., 2013; Kaplan & Gangestad, 2005)。另一方面, “快策略”个体为增加有利资本, 倾向于做出更多的繁衍努力, 提高生育意愿(Belsky, 2010)。因此 SSS 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通过生命史策略的中介作用来实现。据此, 我们假设生命史策略在 SSS 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 提出以下理论模型(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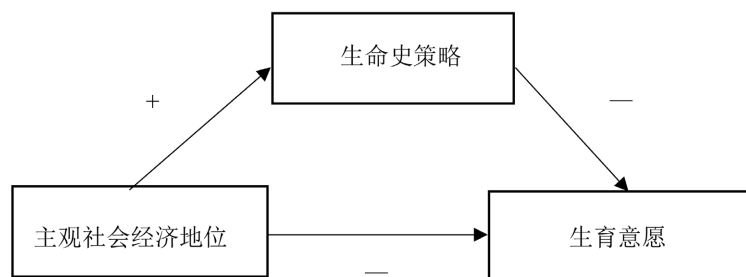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diagram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ffecting life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

图 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生育意愿的假设模型图

3. 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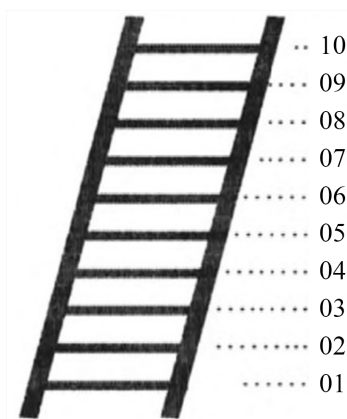
3.1. 被试

通过使用问卷星平台，在各大公共场所随机招募被试，共 271 人，得到有效数据 263 人，其中男性 117 人，女性 146 人；平均年龄 21.27 ± 4.08 岁。

3.2. 研究工具

3.2.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参照 MacArthur 阶梯量表(Kraus et al., 2010)测量被试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从很低到很高进行 1~10 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Cronbach's $\alpha = 0.72$)。



3.2.2. 生命史策略量表

采用王燕等人修订的 Mini-K 生命史策略量表(王燕等, 2017)，量表内容是设计成评估个体在慢策略维度上的得分，量表共计 18 题，采用 Likert7 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生命史策略越慢(Cronbach's $\alpha = 0.86$)。

3.2.3. 生育意愿量表

采用(郑真真, 2014)编制的量表，包括 3 个条目，“对孩子的喜爱程度”、“你理想生育孩子的个数”以及“生育意愿的强烈程度”，问卷采用 Likert5 点计分(Cronbach's $\alpha = 0.67$)。

3.3.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PROCESS 3.3 (模型 4)用于间接影响分析。

4. 结果

4.1. 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SSS 与生育意愿($r = -0.038, p > 0.05$)呈负相关, SSS 与生命策略($r = 0.287, p < 0.001$)呈显著正相关, 生命史策略和生育意愿($r = -0.319, p < 0.001$)呈显著负相关, 参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观测变量	$M \pm SD$	1	2	3	4
1. 性别	1.56 ± 0.50	1	-	-	-
2. SSS	5.00 ± 1.63	0.098	1	-	-
3. 生命史策略	99.87 ± 14.75	0.191**	0.287**	1	-
4. 生育意愿	9.45 ± 3.72	-0.008	-0.038	0.319**	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以下同。变量编码: 男性 = 1, 女性 = 2。

4.2. 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 Bootstrap 法, 使用 PROCESS 3.0 宏程序中的模型 4 验证中介模型。以 SSS 为自变量, 生命史策略为中介变量, 生育意愿为因变量。结果显示(见表 2 和图 2), SSS 能显著正向预测生命史策略($\beta = 2.59, p < 0.001$); 当把 SSS 和生命史策略同时作为预测变量, 生育意愿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 生命史策略正向预测生育意愿($\beta = 0.09, p < 0.01$)。SSS 可以负向预测生育意愿($\beta = -0.32, p < 0.05$)。此外, 生命史策略产生的间接效应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但直接效应包括 0, 说明生命史策略在 SSS 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存在间接效应, 但总模型不成立。

Table 2. Mediating role of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

表 2. 生命史策略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直接效应	-0.32	0.13	-0.13	0.10
生命史策略	0.23	0.73	-0.59	-0.45

注: Boot 标准误、Boot CI 下限和 Boot CI 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 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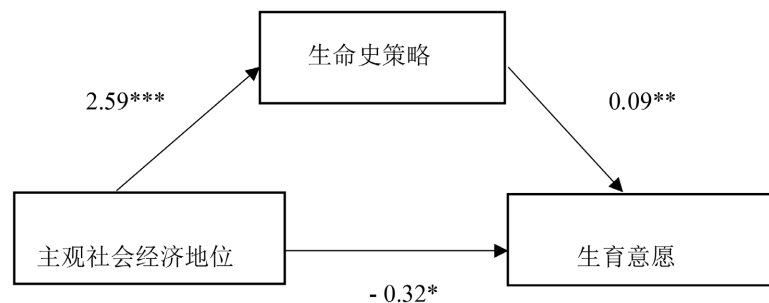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mediating role model of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

图 2. 生命史策略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意愿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5. 讨论

在研究样本的结果中发现,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 与以往的研究一致(吴帆, 2020; 周国红, 何雨璐, 杨均中, 2021), 符合 Gary S. Becker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的观点(Becker, 1960)的观点。根据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的观点, 对生活质量的关注, 导致个体较低的生育意愿,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培养一个高品质的孩子需要通过一系列现有或未来的经济、价值等资源投入才能实现。另外, 在现有资源的前提下, 孩子数量的增加会减少单个孩子所能获得的资源, 以至于降低孩子的质量。因此, 大多数高 SSS 父母选择减少孩子数量, 将所获得的资源投入到培养高质量的孩子中, 这不只是对自身发展需要的认识, 同时也为子女提供更可靠的保障。John Caldwell 财富流理论(Caldwell, 1982)同样可以解释该现象, 以往以及当今, 人们养育孩子都带有一种“养儿防老”的观点, 但随着社会福利的提高, “养儿防老”的保险价值逐渐下降, 而养育一个孩子, 从幼年到成人的整个过程需投入巨大的资源, 所以大多数高 SSS 都会降低生育意愿。

研究发现, 生命史策略在 SSS 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间接效应显著, 即, SSS 通过生命史策略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同时, 生命史策略正向预测生育意愿, 表明个体的生命史策略越慢, 生育意愿越高, 这与研究的假设和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反。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研究中大多数样本为刚上大学的一年级学生, 他们对生育的相关概念还没有深入的认识, 并且研究的样本较少, 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未来的研究应对接近育龄的群体进行施测较为合适。

本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生命史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结果, 进一步构建了一个的中介模型, 考察生命史策略在 SSS 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于深化、扩展 SSS 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研究具有一定积极的理论意义。

6. 结论

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具有负向影响; 2) 生命史策略在 SSS 与生育意愿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

参考文献

- 陈建新, 王莉君(2021). 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 CGSS2017 数据的实证分析. *调研世界*, (6), 58-64.
- 陈卫(2019). 中国的两孩政策与生育率.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6(5), 57-68.
- 方长春, 陈友华(2016). 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将形塑 M 型社会. *探索与争鸣*, (1), 59-63.
- 洪岩璧, 华杰(2020). 健康行为代际传递模式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基于 CHNS2015 的实证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4(6), 39-48.
- 林镇超, 王燕(2015). 生命史理论: 进化视角下的生命发展观. *心理科学进展*, (4), 721-728.
- 刘金菊, 陈卫(2019). 中国的生育率低在何处? *人口与经济*, (6), 70-81.
- 茅倬彦, 罗昊(2013). 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 *人口研究*, 37(1), 84-93.
- 人民网(2021-06-22). *实施三孩政策 完善配套措施*. <http://cq.people.com.cn/n2/2021/0622/c365405-34786992.html>
- 汤兆云, 郭真真(2012). 经济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一项经验研究: 基于 621 份调查问卷的数据. *人口与发展*, 18(3), 29-35+88.
- 王记文(2018). 很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GSS (2010~2015)重复调查数据的分析. *西北人口*, 39(4), 73-80+88.
- 王燕, 林镇超, 侯博文, 孙时进(2017). 生命史权衡的内在机制: 动机控制策略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报*, 49(6), 783-793.
- 王煜, 李梦菊(2020). 建设性还是破坏性? 羞愧的双路径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 28(8), 1325-1336.

- 吴帆(2016). 欧洲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变化——兼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 *社会学研究*, 31(1), 49-72+243.
- 吴帆(2019). 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否存在?——对后生育率转变国家(地区)生育率长期变化趋势的观察. *人口研究*, 43(4), 50-60.
- 吴帆(2020). 生育意愿研究: 理论与实证. *社会学研究*, 35(4), 218-240.
- 邢采, 孟彧琦, 林青青, 秦子玉(2019). 生育年龄限制感提高女性的计划生育数量. *心理学报*, 51(4), 428-436.
- 郑真真(2014). 生育意愿的测量与应用. *中国人口科学*, (6), 15-25+126.
- 中央政治局(2021-5-31). 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 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 周国红, 何雨璐, 杨均中(2021). “生育主力”缘何有名无实?——基于 743 份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问卷调查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 (5), 77-86+157-158.
- Baizan, P. (2021). Welfare Regime Patterns in the Social Class-Fertility Relationship: Second Births in Austria, France, Norwa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73, Article ID: 100611. <https://doi.org/10.1016/j.rssm.2021.100611>
- Becker, G. S. (196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p. 209-24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 Belsky, J. (2010).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Psicothema*, 22, 28-34.
- Berent, J. (1952). Ferti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Population Studies*, 5, 244-260. <https://doi.org/10.1080/00324728.1952.10416679>
- Boberg-Fazlic, N., Sharp, P., & Weisdorf, J. (2011). Survival of the Richest? Social Status, Ferti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41-1824.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5, 365-392. <https://doi.org/10.1017/S136149161100013X>
- Caldwell, J. C. (1982).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London & New York Academic*, 85, 1210-1211.
- Ellis, B. J., Figueredo, A. J., Brumbach, B. H., & Schlomer, G. L. (2009).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Risk. *Human Nature*, 20, 204-268. <https://doi.org/10.1007/s12110-009-9063-7>
- Figueredo, A. J., Wolf, P. S. A., Olderbak, S. G., Gladden, P. R., Fernandes, H. B. F., Wenner, C. et al. (2014). The Psychometric Assessment of Human Life History Strategy: A Meta-Analytic Construct Validation. *Evolutionary Behavioral Sciences*, 8, 148-185. <https://doi.org/10.1037/h0099837>
- Flanders, N. A., Fishbein, M., & Ajzen, I. (197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2089). Addison-Wesley.
- Griskevicius, V., Ackerman, J. M., Cantú, S. M., Delton, A. W., Robertson, T. E., Simpson, J. A. et al. (2013). When the Economy Falter, Do People Spend or Save? Responses to Resource Scarcity Depend on Childhood Environmen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197-205.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2451471>
- Griskevicius, V., Delton, A. W., Robertson, T. E., & Tybur, J. M. (2011a). Environmental Contingency in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The Influence of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eproductive Tim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00, 241-254. <https://doi.org/10.1037/a0021082>
- Griskevicius, V., Tybur, J. M., Delton, A. W., & Robertson, T. E. (2011b). The Influence of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isk and Delayed Rewards: A Life History Theory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 1015-1026. <https://doi.org/10.1037/a0022403>
- Kaplan, H. S., & Gangestad, S. W. (2005). *Life History Theor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John Wiley & Sons, Inc.
- Kraus, M. W., Côté,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1716-1723.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0387613>
- Singh-Manoux, A., Adler, N. E., & Marmot, M. G. (2003).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ts Determinant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easures of Ill-Health in the Whitehall II Stud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6, 1321-1333. [https://doi.org/10.1016/S0277-9536\(02\)00131-4](https://doi.org/10.1016/S0277-9536(02)00131-4)
- Torres, A. (2020). *Analysis of Latin American Fertility in Terms of Probable Social Classes*. MPIDR Working Papers.
- Whelpton, C. V. K. K. (1949).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Fertility. IX. Fertility Planning and Fertility Rates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27, 188-244. <https://doi.org/10.2307/3348166>
- Zhang, G. (2004). Does th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Affect Fertility Preferences? The Case of China. In *12th Biennial Conference: Population and Society: Issue, Research, Policy*. Austral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